西学东渐 首倡留美

——谈提倡留学教育先驱容闳的教育思想



容闳（1828年～1912年），字纯甫，号达萌，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县）人。1835年附读于澳门古特拉夫夫人（Mrs. Gutzlaff）设立的女校，1841年入玛礼逊学校（Morrison School）学习，开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1847年1月随玛礼逊学校校长勃朗（Rev. S. R. Brown）赴美留学，入马萨诸塞州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英文班学习，学习了算术、文法、生理、心理和哲学等课程。毕业后，于1850年入耶鲁大学学习，1854年毕业。

容闳曾说："以中国人而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实自予始。"他在开始赴美求学时就说："予之意想得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为事实者，尚有二事：一为予之教育计划，愿遣多数青年子弟游学美国。”在入耶鲁大学时，他就立下了为祖国服务的志愿，他说“：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以竟吾素志”。大学毕业后，容闳拒绝留在美国，抱着“归国建造中华之想”于 1855 年回到祖国。

回国后，他目睹了清政府残酷镇压太平军和屠杀百姓的事实，这使他甚为懊丧。他在“愤懑之极，乃深恶满人之无状，而许太平天国之举动为正当”。他倾向于太平天国革命，“乃几欲起而为之响应”。1860 年，容闳走访太平军，向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提出改良政治的七点建议。这七点建议是他多年酝酿的维新改良计划，其核心是教育。由于太平天国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容闳的改良计划未能实现。1863 年，容闳会见了曾国藩，为洋务派筹建江南制造局，建议“于厂旁立一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验，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他的这条建议被采纳。1867 年，容闳通过当时的江苏巡抚丁日昌将他的教育计划转寄给北京的军机大臣文祥。后因文祥谢世，教育计划被搁置。1870 年，在曾国藩、丁日昌的支持帮助下，容闳的教育计划被清廷批准，派遣留学生的计划于此后实行。甲午战争后，容闳走上了康、梁变法维新的道路。戊戌政变发生后，容闳因“隐匿党人之嫌，不得不迁徙以逃生”，托迹上海租界。同时，他在上海组织强学会，“以讨论关于维新事业及一切重要问题为宗旨”，并被选为第一任会长。1900 年，容闳参加了唐才常组织的自立会活动及上海张园“中国国会”，被公推为自立会的会长，准备自立军起事，被张之洞通电缉拿，被迫逃到香港。此后，他热烈支持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1902 年兴中会策划广州起义，容闳积极赞助；起义失败后，清政府下令通缉，容闳被迫逃往美国避难。1912 年 4 20 日，容闳病逝于美国康州哈德福特城。容闳的主要著有：《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中文译名:《西学东渐记》)。

容闳的教育思想主要反映在《西学东渐记》中的第十六章《予之教育计划》中。《予之教育计划》一文叙述了容闳留学归国的教育主张和教育计划。他想以资产阶级教育为手段改造中国,“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从而实现他的报国之志。他认为其教育计划的实施,将使“中西学术萃于一堂”;“将来世界成为一家”。《予之教育计划》以留学教育为核心,涉及建立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和近代科学技术教育。

一、关于建立学校制度

容闳是近代中国提出建立军事学校和实业学校的先驱者。他认为:近代战争,需要军官具有一定的军事理论和战术思想,因此应设兵工学校;近代化的机器生产,需要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和熟练的技工,因此提倡设立实业学校。其教育和社会需要相结合的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个开创性的里程碑。

容闳的关于建立新型学校的设想,在《西学东渐记》第十章《太平军中之访案》中已见端倪。他向洪仁玕提出的改良政治、改造中国的七项建议中有四项涉及到新型教育制度,包括设立武备学校(第二项)、建立海军学校(第三项)、颁布各级学校教育制度(第六项)、设立各种实业学校(第七项)。容闳将建立新型学校、改造旧的教育体制,作为他推行教育计划并改造中国的重要方面,对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关于留学教育

留学教育是容闳教育计划的核心,他把派学生出国学习作为改造中国、实现近代化的重要措施。他说:“留学生的计划,是我对中国的永恒热爱的表现,也是我认为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为切实可行的办法。”

鉴于江南制造局附设兵工学校的愿望得以实现，容闳增强了推行其教育计划的信心。1867 年,他通过丁日昌转呈给文祥的条陈四则中，阐述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规划，条陈的第二条阐明了他关于派遣留学生的建议。他在条陈中说：“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则以后即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并须以汉文教习同往，庶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至学生在外国膳宿入学等事，当另设留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之。此项留学经费，可于上海关税项下，提拨数成以充之。”

在《予之教育计划》中,容闳还特别申明“:此条陈之第一、三、四,特假以为陪衬 眼光所注而望其必成者,自在第二条。’显然,容闳将派遣留学生作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极为重要的条件。

容闳的教育计划因文祥谢世而暂被搁置后，他于 1870 年再次向曾国藩建议推行其教育计划，并获得曾国藩、丁日昌帮助。清廷首肯后，其教育计划得以实施。容闳因其计划的实施而喜出望外，并说 教育计划的实施“;将于中国两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

容闳的宿愿实现了，他立即拟定派遣计划，并在上海成立了出国预备学校，他被任命为留学事务所的监督。1872 年夏季末,第一批学生 30人,渡太平洋而赴美国。此后,留学生按计划一批批赴美学 习 。

这批留学生在美国“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西方文化及文明，亲身目睹美国人民共同生活中的民主方式及无数其他有意义的活动”。他们的艰苦奋斗、积极向上，给美国人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受到美国人民的赞扬。在这批‘ 幼童 ’中,出现了詹天佑、吴仰曾、蔡绍基、张广仁、梁敦彦、唐绍仪、薛友福、梁应科等在中国近代史上

有影响的人物。这些成绩，是与这位早期资产阶级教育家容闳呕心沥血的谋划与操劳分不开的。

容闳是我国鸦片战争后最早到西方接受西方学术（西学）的中国人之一。他系统地接受了资本主义教育，不仅学到了科学知识，而且接受了民主思想和精神，成为提倡西学的启蒙思想家。他看到了将来世界学术荟萃一堂的历史趋势。他的最大贡献在于最早提出资产阶级的改良计划和推动西学东渐，开创了我国留学教育的先河。

容闳的教育计划与旧封建教育是不同的。他倡导的留学教育是要培养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人才，这与旧封建教育要培养的忠臣和顺民截然不同。他的教育计划虽在洋务派人物曾国藩的支持下得以实现，但终因与封建统治者的利益相矛盾而宣告夭折。虽然他的教育计划未完全实现，但他关于建立新的教育制度的设想、关于留学教育的思想却在中国教育史及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小芳）

主要参考文献

1 容闳著　西学东渐记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2 毛礼锐,沈灌群主编　中国教育通史(第 4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
3. 容闳著　西学东渐记　长沙：岳麓书社,1985
4 容闳著　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　北京：中华书局，1991
5 容闳著　西学东渐记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育才之法 匪限一途

——谈李端棻的革新教育思想



李端棻（1833年～1907年），字芍园，号信臣，贵州省贵阳人，清代政治活动家。1863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职，以后历任云南学政和刑部侍郎等职。前后四任乡试考官，一任会试副总裁。甲午战争后，李端棻赞同康有为等人的变法主张，倡办新学，于1896年6月，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凡各省、府、州、县遍设学堂，分部学习”，并提出“建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等多种育才之法”。同年8月21日，他的《议复开办京师大学折》出台，第一次将筹办京师大学堂提到议事日程。1898年他密荐康有为、谭嗣同于光绪帝。同年，就在

京师大学堂创设同时，李端棻又上疏请著各省督抚，选各省在籍绅士督办中小学堂，并得旨准允。不久，被擢升为礼部尚书。戊戌政变发生后，李端棻自疏检举，诏革职充军新疆，中途因病留居甘肃，1901 年赦归原籍。在贵州，他曾主讲经世学堂，后又创办公立师范学堂、贵阳中学堂。1907 年病逝。

李端棻生活在国家衰落、列强瓜分的危机时代，他和当时很多有识之士一样，顺应时代潮流，为救亡图存积极参与变法，成为当时维新派官僚之中坚。梁启超曾评述过：“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

李端棻深知，变法之要在于人才，而人才之兴又在于推广新教育。因此，他大声疾呼，必须改革旧的学校教育制度，要建设培养新人才的新的学校教育体系。他根据当时社会发展状况，提出了一整套改革旧教育、建设新学校的方案。

事实上，早在变法之前，李端棻就向光绪帝力陈发展新教育的重要性，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以之为地方学校之首倡和典范，广立各省府州县之学”，作为培养新人才的基地，并指出“为时事多艰，需才孔亟，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而资御海。”他还对京师同文馆创办以来的“教之道未尽”之事予以深刻的检讨，认为其积弊有五：(1) 当时虽然已设西文学馆，但“治国之道，富强之原，一切要书，多未肄及”，不足以救国；(2) 对格致、制造之学(数理化诸学)，未重专门深造，不能致精，表现为“学业不分斋院，生徒不重专门”；(3) 所学诸学不重试验、察勘，终成空谈，不能致用；(4) 学者仍追逐功名利禄，“俊慧子弟，率从事帖括以取富贵，及既得科第，遂与学绝，终为弃材”；(5) 学校太少，“十八行省只有数馆，每馆生徒只有数十……养成之才万不足一”，不济时需。有鉴于此，李端棻提出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新式学校教育制度和具体的课程计划，初步形成

了自己比较系统的教育思想。

（一）他把学校分成三个级别类型，并规定了入学及修学年限。“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府、州、县学，选民间俊秀子弟 12～20 者入学”；省学选诸生年 25 以下”；京师大学，选举贡监年 30 以下入学”。规定以上三学，修业年限均三年。

（二）三级学校课程各有区别：府、州、县学除讲《四书》、《通鉴》、《小学》等外，“辅之以各国语言文字及算学、天文、地理”，另外还讲授简明世界历史和格致；省学除经、史、子及国朝掌故诸书外，辅之以天文、舆地、算学、格致、制造、农商兵、矿、时事、交涉等；京师大学“课程一如省学，惟益加专精”。以上三级学校均课以中西诸学，并须以实学实用为旨。

（三）在他的这份计划中，包含了融通同等学力的社会教育思想：在府、州、县学中，“原地方学校诸生，也可入学学习”；在省学中，“有举人身份者，也可参加肄习”；京师大学，“京官也可参加听课”。

（四）由于省学、京师大学课程较多，学生难及专门，李端棻设想，“仿宋朝胡安定设科分斋讲习（即类似今天大学的分系科专业），以专其成”。

（五）学成诸生赐给相应“出身”，以获社会尊重。

李端棻深知：“兴办如此之多的学校，所费必多”；“所立学堂既众，所需教习亦众”，而国家“正值患贫”，如何解决办学经费紧张、师资短缺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李端棻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可行的方案：(1)“令每省每县各设其一院，增广课程，变通章程以为学堂”，书院旧有公款不足部分再由国家拨补。这样就可以“因旧增广，则事顺而易行，就近分筹，则需少易集”。这样的办学思想，对我们今天不少贫困地区因地制宜地搞好基础教育、多渠道办学仍有启发意义。但是，李端棻也指出：“惟京师学堂为首善之区，不宜因陋就简”，因此，国家可动用库存，办好这座示范性大

学。(2)对于如何解决教师匮乏、加强师资建设问题,李端棻也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对教者不可要求精深(在当时的环境下),可由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举才;“或就地延聘,或考试选补”。他坚信,偌大一个中国;“必有可以充其任者”。

除了学校课堂教育外,在培养人才的途径上,李端棻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在《请推广学校折》中指出:“育才之法,匪限于一途。”他认为培养人才可通过多种途径、多种渠道,于是提出了一套“与学校之益相须而成”的办法:(1)设藏书楼,即今之图书馆。“自京师及十八行省省会,咸设大书楼”,把各种版本、各类书籍,特别是“同文馆制造局所译西书,按部分送省以实之”,“许人人楼观书”,如此;“向之无书可读者,皆得以自勉于学,无为弃才矣”。此举即使在今天也不失为增广教育作用之良法。(2)创仪器院,即今之仪器实验中心。李端棻曾奏请“所立诸学堂,咸别设一院,购藏仪器,令诸学徒皆就试习”。经费由“每省拨万金以上已可粗备”。以后还可“陆续添置,渐成大观”。这种在一个地区集中力量建设仪器实验中心的做法,对今天来说,特别是对经费困难、实验设备较差的地方,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值得提倡推广。(3)开译书局。李端棻认为必须多译有关学校、农政、商务、铁路、邮政等方面的书籍,特别是西方新技术,更要尽快译书;“随时布刻,廉值出售”。这样可增益见闻,开阔眼界,解放思想,建树新人才。(4)广立报馆。李端棻认为‘知古而不知今’是为‘腐儒’,而‘欲通今者莫若阅报’,并请于京师及各省会、并通商口岸、繁盛镇埠、成立大报馆”;“广印廉售,布之海内”。李端棻深刻地认识到新闻报纸的作用,并将其作为开发人才、改革教育的重要手段,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具有远见卓识。(5)选派游历。李端棻指出,学生受学数年,考试合格后,“当选高才以充历”。或游历各国,或游各省,两者虽要求略有不同,但两者都应‘随时著书归呈有司”。前者要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后者要结合本专

业广泛开展实地考察或实习，要搜集资料，写出考察报告或论文。

李端棻这一套建设新教育的设想是顺应当时时代发展潮流的。纵观他的这些设想，在创办新式学校时，宏观上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的：一是广设普通学校，重视基础教育；二是开设新型综合性大学——京师大学堂；三是书院改制百日维新的教育改革基本上围绕这三个方面展开的。

戊戌政变后，李端棻被贬新疆，得赦回贵州后，意气不减当年，仍大力提倡新学，积极传播西方先进的政治哲学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在他主讲经世学堂时，以《新民丛报》展示学生，大讲"卢梭论"、"培根论"、人权、自由等，并以此出题，课考诸生。

李端棻是清末一位比较有远见卓识的政治活动家。在教育上，他提出了一整套改旧建新的方案，对近代教育制度的变革起了积极的作用。他的《请推广学校折》是中国新教育运动发生转折性变化的纲领性文件。在这份奏折里，他所提出的教育改革思想，虽未完全摆脱旧教育的羁绊，但已具有了新教育的许多特点，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明显的进步性，他的教育思想对当时新的教育事业发展无疑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李永生）

主要参考文献

1. 中国教育大系编纂委员会编．中国教育大系．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2. 谭佛佑．浅谈李端棻对戊戌前后革新教育的贡献．贵州文史丛刊．1984(2)
3. 李端棻著．请推广学校折
4. 清史稿 李端棻传
5. 赵尔巽等编著．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谈张之洞的洋务教育思想



张之洞（1837 年～1909 年），字孝达，号香涛，河北省交河县（直隶南皮）人。他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1863 年（同治二年）考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开始了仕途生涯。1882 年任浙江乡试副考官，不久担任湖北学政、四川学政和国子监司业；1882 后任山西巡抚。1884 年任两广总督，1889 年任湖广总督。1907 年清政府任命他为协办大学士。后任军机大臣，兼管学部，总揽了全国教育大权。1909 年病卒，谥号“文襄”，其著作收在《张文襄公全集》。

张之洞提倡洋务，曾设立洋务局、织布局、枪炮厂和铁厂。在兴办洋务教育方面，他曾主持创办了军事学堂、实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业学堂、外国语学堂、小学、幼儿园和师范学堂。

张之洞在他 1898 年撰写的《劝学篇》中详细地论述了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1903 年他主持起草了《奏定学堂章程》，制定并实施了我国第一个近代学制。1905 年他与袁世凯、赵尔巽、端方等人，联名奏请立即停止科举，使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至此完全废止。

张之洞是我国封建主义教育制度的积极维护者，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思想和制度的奠基人。其基本教育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叫作“旧学为体、新学为用”，集中反映在《劝学篇》中。他指出：“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这是他洋务教育的中心思想。

他认为：所谓中学，主要就是中国的经史学，应放在学习的首位，学生应先从经史学中学得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所谓中学为体，即在于“明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是‘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侍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他认为这三纲乃是千古不变之道，凡胆敢违反这种道德者则“将众恶而共弃之”。三纲中，他特别注意的是“君为臣纲”，这正是他反对维新变法的主要论据。他针对维新派所提出的有限的民权思想指出：“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1903 年在他的“奏定学堂章程”中，为了“明纲”，把“忠孝”明确地作为各级各类学校的立学宗旨，规定“至于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这种办学宗旨源于《劝学篇》，是“内篇务本，以正人心”的具体化，把“明纲”进一步法制化。这种立学宗旨在当时腐朽没落的清政府内很受欢迎，对清末的教育影响

很大。

所谓西学,包括西政、西艺,按他自己的解释“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在这里他所提出的“西政”,并不是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也不是维新派所主张的改良君主专政政体的政治,而是学习西方办新式学校,学习西方赋税管理和通商办法等;他所提倡的“西艺”也只是一些浅显的自然科学知识,其目的是,客观上也仅仅是为适应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需要,为洋奴买办培养“人才”。

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其根本目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但他能把“西学为用”作为办学宗旨,毕竟是第一次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学校教育进行了一些全新的改革,把长期形成的封建教育打开了一个缺口,在客观上对封建制度的解体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虽然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先形成的系统的学校制度是 1902 年张百熙的《钦定学堂章程》(1902 年为壬寅年,故这个学制称“壬寅学制”),但这个学制公布后并没有实施。1903 年清政府又命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共同修改《钦定学堂章程》,拟定了《奏定学堂章程》,并于 1904 年颁布执行。这个章程规定了学校系统、各级各类学堂章程、学校管理法、教授法等学校制度。1903 年为癸卯年,这个学制也称“癸卯学制”。

“癸卯学制”从纵向把整个学程分为三段七级: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包括蒙养院四年,初等小学堂五年,高等小学堂四年 第二段为中等教育,包括中等学堂五年;第三段为高等教育,包括高等学堂三年,分科大学堂三至四年,通儒院五年。“癸卯学制”从横向与高等小学堂、中等学堂、高等学堂相对应,并列设立了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个系统。

“癸卯学制”是中国第一个正式颁布并在全国范围内实际推行的新学校教育的学制，对近代中国的学校教育制度影响很大，清末、民国初年的新学校教育制度主要以此为依据。

《奏定学堂章程》规定的立学宗旨及各级各类学校具体的课程设置,进一步体现了张之洞《劝学篇》中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奏定学堂章程》中规定‘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它日成才,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各级学校具体课程设置为：初等小学每年的必修课程要上课 30 小时，读经讲经每周就要用 12 小时,占全部课程的 2/5；高等小学四年的必修课程每周要上课 36 小时，读经讲经就要 12 小时,占全部课程的 1/3;中学堂的必修课程要求,必须在五年内读完《孝经》、《论语》、《孟子》、《易》、《书》、《诗》、《左传》、《礼记》、《周礼》、《仪礼》十经的节选本。不难看出,这种课程安排,正是为了防止学生‘离经叛道’,防止学生参加当时日益发展的革命活动,防止学生接受进步的民主思想,而使学堂教育先行‘务本’、‘正心’之教。当然，为了培养精通洋务的人员和加工业所需的技工，新学制中也安排了一些自然科学和‘实业’技能的课程。

《奏定学堂章程》中的立学宗旨和具体的课程设置很明显地反映出半封建半殖地的教育特点，中学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为基”,西学以‘智识’、‘艺能’为主,造就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服务的实用的‘通才’。

1903 年张之洞、张百熙、荣庆合写《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奏折中说‘:由科举未停,天下士林谓朝廷之意并未注重学堂也。’他们建议‘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但该制度依旧存在,它已经成为兴办学校的障碍。1905 年张之洞、袁世凯、赵尔巽、周馥、岑春煊、端方联合奏请立停科举。他们认为‘: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

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由于大势所趋,清政府于同年八月下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至此,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终告废除。

科举制度的废除，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一件大事，它标志着封建教育制度在形式上的结束，一个新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制度在形式上逐步形成。

废除科举制度后，在新的教育制度的推动下，全国学校迅速发展。据学部统计，自 1903 年至 1909 年学校数目由 719 所增加到 52000 多所,约增加 73 倍,学生人数增加 225 倍。

洋务教育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恰恰是当时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在教育上的反映。他的“西学为用”(《劝学篇》)立学宗旨和各级各类学校具体课程的设置(《奏定学堂章程》)以及“废科举兴新学”(《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在当时起到了进步作用,打破了封建教育制度的统治，确立了近代教育制度，客观上起到了加速封建统治解体的作用。

(孙崇熹)

主要参考文献

1. 王炳照等主编．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 陈景磐编．中国近代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3.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4. 清末教育立法．暨南学报（哲社版）.1998(3)

中山国父 丹徒国师

——评爱国教育家马相伯

4

马相伯(1840 年 ~1939 年),本名良，又名逮常；字相伯，或作湘伯、芗伯 晚年号“ 华封老人 ”,江苏丹阳人，生于丹徒(镇江)。远祖为元朝《文献通考》著者马端临，故自童蒙起，深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熏陶。但马氏家族自明朝以来，世奉天主教，故 11 岁时即到上海徐家汇，入耶稣会新创办的依纳爵公学求学。30 岁时得神学博士学位，授职司铎。1872 年始任徐汇公学校长,同时精心研究天文学、数学,著《度数大全》一百二十卷。由于鼓励学生参加科举考试，以供清政府选拔人才，受到法国教士猜忌。1876 年,他决心亲身参与爱国求强事业，遂脱离教会，投入

李鸿章淮系的洋务运动。先后奉命王办山东机械局，出任驻日本使馆参赞、驻神尸领事，赴朝鲜任其国王新政顾问，回上海与美商旗昌洋行谈判，收回招商局主权。1886 年奉命赴美国商借巨款以建海军,因受朝中保守势力反对,功败垂成。遂远游西欧英、法、意各国，考察政务民情，觐见罗马教皇；并访问了牛津、剑桥等著名学府。由于“泰西各国”教会以及教士个人的办学传统、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方式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初萌在中国创办新式中西大学堂之志。1897 年，他恢复与天主教耶稣会的关系。1900 年,他已是 60 高龄，回溯生平，目击身历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以及当时八国联军侵华之战，深深感慨“清廷外交凌替，一不知公法，二不习制造，入手工夫则文字尚无”。为培养精通‘欧美国际文字’的政治、外交、科学人才,遂‘将余名下松(江)、青(浦)两邑田三千亩,捐为基本金”,“悉数献于丌南司教日后所开中西大学堂收管”。1903 年,在上海徐家汇天文台的一间偏院小屋，年逾花甲的老人马相伯面对二十多名青年，气宇高昂地说：“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字始。有欲通外国语言文学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革命救国之准备者，请归我！”于是，一所酝酿多年的“中西大学堂”——震旦学院，成其雏形了。他成了中国近代第一位独资创办高等学校的教育家。此后 30 余年,他以花甲、耄耋、期颐之身，一方面不倦地投入政治运动，包括辛亥革命前的立宪改革、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建造，30 年代以须眉皆白之身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奔走疾呼，沈钧儒等救国会七君子尊之曰：“唯公马首是瞻”；另一方面则热情地献身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卓有建树，许多学者、专家、政要人物,都曾师从于他,例如梁启超、蔡元培、于右任、邵力子等人。马相伯于是成了 20 世纪享誉中国政坛、杏坛的著名爱国老人、政治活动家、教育家乃至天主教会的革新家，被誉为中华民国的‘国师’,与孙中山被誉为‘国父’并称。他的著述已由复旦大学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